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

(第三版)

王逸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

(第三版)

王逸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王逸舟著.—3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ISBN 978-7-208-15269-4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9983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三版)

王逸舟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4

字 数 333,000

版 次 2018年7月第3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269-4/D·3237

定 价 78.00元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冯绍雷 陈 昕

编 委：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李敏焘 陈 昕 秦亚青

黄仁伟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來。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

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割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疑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

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饕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5

第三版说明

本书出版已二十年。现在它还在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一些院校使用,这是当初本人没有料到的。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潘丹榕女士的提议,让自己有机会对它做些完善的工作。对照以前的版本,这一版主要有两个变化:一是补充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情况,例如建构主义冲击波和近年的发展态势,二是简化原有结构与叙述,使读者容易理解内容。当然,里头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很清楚,毕竟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有限,这门学科的线索又那么繁杂。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历史阶段划分本无定论,以几场大辩论引导学科进步作为主线,只是个人的认知及写法。

来到北大国关院已近十年,愈发熟悉和喜爱这里的环境。此书的修订如同近年其他著述一样,离不开周围人的启迪和帮助。在此,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包容,感谢缉思、袁明等师长的提携,感谢同事和学生的支持,感谢家人和亲友的理解。

2018年四月于北大住所

再版小记

本书原稿的撰写距今已有八年。自我反思，初版的“美国化”痕迹太重，它与写作的条件不无关系。修订后的版本，增加了非美国区域（主要是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反映出近一时期个人的研究取向。近些年我先后设计和主持了“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和“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两个课题，对美国人主导的传统观点有了更多审视，对欧洲及其他一些地区学者的创新更加在意。

新版本（尤其是后面）更多使用了“国际关系”的提法。我越来越觉得，“国际政治”术语的容量相当狭窄，不如“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全球政治”等概念适用。考虑到本书第一版在读者中的影响，新本沿用了原书的标题，大部分章并未改动原先的提法。谨请读者明察“国际政治”术语的局限。

在查找和筛选各种资料文献时，头脑中逐渐清晰的全球主义观念起了作用，因而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博弈论”及“战略文化”等属于权力政治学的学说较少细究，而把主要篇幅用于讨论西方国际政治学之逐步多元化、多样化的过程，特别是主流之外的发展。这既反映本书的特点，也有它的结构缺陷。

我希望新版本有一些新气象，却不奢望它一下子有大的改观，毕竟总体框架早已设定，变动起来确实不易。也许过几年，自己还有机会和心情，依照新的形势和进展再次修订书稿。我喜欢这种寻求变化和进展的感觉，享受对它的预期。这也算是读书人的一种“特权”吧。

需要感谢的人很多，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致敬。首先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正是他的提醒，使我下决心抽出时间，对原版做了修补和充实；其次，要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秦治来

博士和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系的苗红妮博士夫妇，他们的认真而细心的勘误工作，使书稿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感谢我所科研处的袁艳滨女士，她对存有不少漏洞的索引重新做了技术编排。最后要感谢那些曾经给我写信或致电、指出书中缺失的读者，他们是值得交往和信赖的朋友。

书稿交送出版社之际，儿子毛毛考上了期待已久的大学。妻子对此倍感欣慰，我也松快了许多。

2005年7月初于家中

致 谢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完稿之际，谨向以下单位及个人表示由衷的谢忱：

感谢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FIA）对我的访问邀请和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在这所闻名遐迩的大学，在世界上最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我度过了近四百个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那真是一个研究者梦寐以求的美好学习时光。

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FCEAR）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江忆恩（A. Iain Johnston）教授和图书管理员南希（Nancy Hearst）小姐给予的多方面帮助，在使我熟悉美国尤其是哈佛的环境、进入研究角色的过程中，他（她）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

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驻京办事处及其主任塞奇（Tony Saich）教授对我哈佛之行的热情鼓励和积极赞助。

感谢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对我近两年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及本丛书主编陈昕先生对笔者一如既往的信任；并感谢胡小静先生再次出任拙著的责任编辑，他的鉴赏能力和严谨态度确实让人敬佩。

感谢我的研究单位——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与支持；这里虽未提及他（她）们的姓名，本人心中实已铭记。

但愿这本书是对他（她）们以及所有关心和信任我的读者的一个好的回报。

作者 1997年10月于哈佛大学

目 录

丛书总序	1
第三版说明	1
再版小记	1
致 谢	1
引 论 本书研究对象	1
第一章 学科发展基础	18
第二章 两大主义之争	49
第三章 行为科学挑战	78
第四章 多元化的拓展	115
第五章 后实证主义观	138
第六章 建构主义崛起	164
第七章 激进学派立场	196
第八章 两极后冲击波	227
第九章 欧洲人的特色	261
第十章 美国重心现象	297
索 引	331

引 论

本书研究对象

国际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研究学科,萌发于近代西欧,成型于战后时期,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的重心一直在美国。这是人们不争的事实。然而,在西方,这门学科究竟研究什么,甚至于怎么称呼,各家各派并没有共识。了解不同的看法,对于这本书的阅读会有重要帮助。

第一节 关于名称

本书的基本范畴——“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也叫“国际政治学”),是流行于当代西方有关这一学科的多称谓之一。经常见到的,还有“国际理论”(international theory),“国际关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事务研究”(the study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关系研究”(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简称 IR study)或者“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以及“世界政治理论”(th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等概念。依笔者本人有限的知识,西方学者在表达这一专业的学科属性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词,分别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理论”。

一般说来,它们各自的涵盖面并无大的差别,因而也往往被交替使用。但是,不论表述上有何不同,上面已经提到的术语,均明显有别于“国际经济”或者“世界经济”等概念。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在我国,人们经常用“国际关系”一词笼统地概括国际政治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社会关系甚至国际文化关系。而在西方,凡说“国际关系”,尤其当涉及“国际关系”的理论时,必指本书所讨论的“国际政治”内容。

概念表述上的这种差别，多与习惯有关，并无对错之分；不过，既然现在我们探讨的对象是西方的学问，把“国际关系”锁定在国际政治层面，算是一个前提。

有趣的是，在西方，概念使用上的不同，与使用者的国别及研究兴趣有一定联系。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指出，英国学者喜用“国际理论”的表述，它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帝国”思想传统。但这种表述“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突出‘关系’的概念，仅仅强调了‘理论’一词”；他本人宁肯用“国际关系研究”一词。¹在当代西方学术的“龙头重镇”美国，以及（由于不难想象的原因）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比较常用的叫法是“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概念的使用也不在少数，它与“国际政治理论”并列为最常见的两个词）。大体上看，美国学者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普遍接受了这一提法的，其原因可能与著名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巨大影响有关，后者在1948年出版的、现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学主要经典之一的《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一书里，自称其宗旨为“展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to present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²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主义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盛，以“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取代“国际政治”的趋势有所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美国以外地区的一些学者）在使用“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概念时，赋予了比“国际政治”更广泛的内涵；比如加上了对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NGOs)]和全球化现象的研讨，以及对“国家中心”范式的批判。

西方专攻此项的研究家，还有深一层的分析：“国际政治理论”一词之所以为美国人推崇，与美国的地位和美国人的心态不无关系。“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这一概念的运用常常造成各种困惑，而且有探究不深之嫌”；唯独在美国，它的使用“似乎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而不止是（像不少国家的情形那样）满足于对现有理论探索的批判指责”。在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代表着一种希望和信念，即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而不只是片面和局部的理论体系；它不仅仅是某个单纯的、普通的理论，而是真正有关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性学说，

这种学说将尽可能地减少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给人们提供明确的行动指南。³

后面有专章介绍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主导作用,这里只做一点提示:无论从整个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看,或从理论层面具体考察,人们都不难发现,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像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许多领域的情形一样,如同美国的国际地位——一直处于领风气之先的位置。在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甚至词汇术语、研究范式、新议怪论也多半出自美国人之手;除少数基本上不处于主流的理论,如法国著名国际政治大师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古典现实主义”(“历史社会学派”),得益于当代德国哲学之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英国人特别钟爱且自成体系的“国际社会理论”,北欧地区的“复合安全理论”,美日以外发达地区的“生态政治”(“绿色政治”)学说,加拿大等国学者倡导的“多边主义学说”,西方国际政治学大体上可以说是美国主导的一门国际政治研究学问。

第二节 研究对象

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国际政治学者对于这一学科的对象有许多争论,至今仍见仁见智、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主要见解有如下四种。

第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国家的外交和国家间的斗争,更确切地讲,是外交政策研究;它基本上属于“政策学”的范畴。持这种见解的人基本同意,国际政治学所要研究的,是国际间各国政府面临的变化多端的形势,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各国对外交往的经验教训,是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对外政策及其依据,是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推进和实现的具体形态。

这既是普通人经常持有的见解,也是有深厚历史传统的看法。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大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国家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基本对象。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到但丁(Dante)的君主论,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

僧侣和神学改革家，无不坚持类似的主张。众所周知，近代欧洲的历史，素以外交斗争、势力均衡、国际联盟和国际法的各种传说及“故事”著称于世，因而上述看法的形成并非偶然。这种根深蒂固的欧洲思想传统，影响到近代以来欧美一批国际政治史家、理论工作者和教授国际关系的讲师。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⁴

一本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评论道：“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的差别问题上大做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从理论上说）等于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它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⁵

造成这一认识的原因，除了历史的一面外，还有现实的、可能更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政府的需求和决策者的偏好。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前主任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分析道：“有些学者，尤其是那些将着眼点盯在国家决策上的人，视自己为理所当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为‘国王们’巩固自身权力和强化国家利益之举出谋划策。战略研究家在这方面尤为明显，他们中有许多人一转身就变成智囊人物或决策者。……他们全力‘揭示’国家利益的概念或促进‘世界秩序’的政策，认为它们会与本国乃至全球的需要相吻合。”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两个原因说明为何来自政府的诱惑会如此之强烈：其一，“国际政治仍然基本上是一种国家上层间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tates）”。政府在其间势必起主导作用。它引导许多人相信国际政治的内涵实质上与国家的对外关系无异。而且，从研究者的角度说，国际政治事务的许多信息和数据（如国际组织的会议、各种演讲和文件等）不可能从政府以外的地方弄到。其二，对一些人来说，“与华盛顿的关系越密切，飞黄腾达的机会越大”；它既有助于实现事业上的抱负，也利于个人各方面的改善。⁶

在当代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确被很多人当成外交政策研究或对外战略研究的同义语，国际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

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Containment)战略和“接触”(Engagement)战略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国家和经济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所能提供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大学和一些公司内有国际关系研究出身或背景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经常作为“座上宾”出入华府，或者保持着学界商界“双栖”的显赫权位。理论之“社会效用”的命题，通过国际政治学这一特殊学科，得到最好的注解(或许在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只有经济学能与之媲美)。⁷

第二，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国家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位(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当然，这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同样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特殊的研究领域和方式，有独到的启示和教训。

这一见解的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他在其引起广泛和持久争论的名篇《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1966年)中提出，如果所谓的“国际理论”指的是一种“探索国家间关系的传统”，并且把它想象成政治学的“双生子”，那么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理论”。他认为，国际研究中确实存在人们引述的一些重要论述，如马基雅维利或康德(Kant)的个别作品，然而它们是零散的、无联系的，实际上不具有政治经典的地位。“政治经典”，指的是在政治学研究中或者政府学研究中，学生们能够读到的那些经久不衰的、自成一体的、反映整个学科观念发展历程的伟大作品，它们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里从古代的柏拉图(Plato)到当代的拉斯基(Laski)的不朽思想，其间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等思想人物及其著作。但是很多人所说的“国际研究”学科，并不存在这样的群体特征和思想连贯性。

怀特分析说，如果说政治学是有关国家(state)的理论，那么国际政治学则应当是一种有关国际社会或国际共同体(the society of states, or the family of nations, 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理论。但这种理论一直散见于国际法中。本世纪以前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大都